

QINGNI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2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SHULUNTA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02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2 年卷)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 / 张健民 杨 群 陈文桂 陈 燕 王 东

责任校对 / 苏 民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25.5

字 数 / 657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168-1/K·055

定 价 / 5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2 年卷，在今年 12 月我所第五届青年学术讨论会前夕出版。2002 年 9 月，所里在昌平召开了第四届青年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收到了青年学者的论文 32 篇。这些作者中，有五位是进所不久的新朋友。这说明研究所又增加了新鲜血液。上述论文，分别从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有些研究是很深入的。有几篇论文通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评议，获得了嘉奖。所里在 2002 年新成立了台湾史研究室，这次讨论会便有几篇讨论台湾历史的论文，这是值得记一笔的。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早进所和刚进入研究所的青年朋友，要注意领会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毋庸讳言，近些年来，学术研究领域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滋长。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抓紧本所青年学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学术界、理论

界纷纷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这位历史伟人。今年也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缔造者、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推动者、本所第一任所长范文澜诞辰 110 周年。我们也要召开会议，来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对我们的前辈所长范文澜先生的认识写在下面，介绍给各位进所不久的青年朋友。

范文澜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经学和文学方面。1929 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注》，多次再版，直到 1958 年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校定本。这本书至今仍被文学史家看作是《文心雕龙》的权威注释本。1933 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重要的学术研究。蔡美彪先生评论说：“范文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北大学习传统国学的最后一班学生，而且是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46 页），就是针对《群经概论》而言。1940 年夏季，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作了三次经学史演讲，毛泽东听了两次。毛泽东在看了他的第三次演讲大纲后，特别给他写信，称赞他的经学史演讲“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指出当时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是思想斗争领域的“第一任务”。这是刚到延安不久的范文澜，作为传统国学的集大成的继承人，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贡献。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史学领域著名的五老之一。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五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各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范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写中国通史的最早的开拓者。1941～1942 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代表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说出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系统看法，是对前此各种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的系统批判，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中

国通史撰写框架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对这部著作给与很高评价，据荣孟源先生回忆，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在延安又作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1页）尽管此后的历史研究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能又有了新的发现和前进，对中国通史的撰写框架可能又有了更好的表达，但是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总体擘画之功是载诸史册、不可磨灭的。建立中国通史撰写的科学框架，我认为这是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首先一个贡献。

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1947年在华北用本名以及随后在重庆、上海用笔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50年代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再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40～60年代所发表的若干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简单地讲就是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把这段历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建立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基础上的划分，这个划分对于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起到了指导作用。尽管他自己对这个体系并不是很满意，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对他所建立的学术体系以及他的一些具体研究结论有不同见解，但是这个体系对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起到了指标的作用。

推动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范文澜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作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研究室主任，在1949年4月带领历史研究室人员从河北正定迁到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安顿在东厂胡同一号。1949年11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范文澜自己的古代史研究正在进行，他没有首先考虑在科学院建立历史研究

所，而是率先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归入科学院领导，改名为近代史研究所。这个举措对于新中国的学科布局，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很显然，在旧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很不受重视的。解放初，各大学纷纷开出中国近代史课程，纷纷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不少大学派出青年教师到近代史研究所进修，今天还活跃在近代史研究工作中的老一辈的研究者，有一些就是在近代史所进修过的。这个研究力量的培养和配置，对于形成后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庞大队伍是功不可没的。刘大年先生在十年前纪念范老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说过：“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见《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再是中国近代史资料的系统编辑。早在建国前夕，范老负责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前身）的成立，就开始筹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个丛刊的编辑委员会赫然列上了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人的名字。范老是实际的负责人和推动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首，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并有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者组成的这个总编辑委员会，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这套资料到 1961 年基本出齐，如果加上 1979 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总共出版了 11 种 66 册。这是新中国出版的最大的一部历史资料书，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新中国史学领域几项大工程，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震资料的编辑，都是和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范老对中国历史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坚持、贯彻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与郭老的争论。范老是“西周封建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历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带动了 50 年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热潮。再一个是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他的争论对象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那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汉民族是何时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范老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秦汉时期的汉族已经符合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的四个特征，已经形成为民族，并且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他提出并坚持这个论点，挑战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是有压力和风险的，事实上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指责。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推动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发展。范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学者的勇敢，主要是对历史要有深入地研究。他说过：“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

这就提出了学风问题。所以，我认为范老对中国历史学的第四个贡献，是提倡并且力行实事求是的学风。范老认为，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那叫做“潦岁蛙鸣”，好像雨后池塘里的青蛙鸣叫，噪音贯耳，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真正进行了研究，作了深入思考，才能数年而一鸣，或毕生而一鸣，真正做到鸣，并不是容易的事。范老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要“神似”，不要“形似”，不要教条主义。范老的书和文章很少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范老经常强调要发扬“二冷”精神，即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这就是说，做学问，要埋头苦干，要不慕虚荣。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范老所提倡的这些学风，实在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细加体会，认真实行。

范老去世已经过去了 34 年。现在历史学界的情况已经发生

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国家的全面开放，与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带来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趋向。史学领域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也在增长。学术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分析和解释的问题，由于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增长，也在史学研究中提出了新的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加以解释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学研究，显然不是老一辈人做完了就万事大吉。在史学研究中，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地开拓。老一辈学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下一代或者下几代还要在他们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现实的变革需要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纪念范文澜诞辰 110 周年，我们要学习范文澜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从“神似”中找出路，去发展我们的史学研究，去提高我们的史学研究，去繁荣我们的史学研究，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为我们的人民的文化需要服务。

为了纪念范文澜先生，写下我的一点感想，与各位共勉。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感谢本书编辑组的劳动，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任务！

张海鹏

2003 年 12 月 17 日

于东厂胡同一号

目 录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李细珠 /1
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简述	崔志海 /23
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点思考	马平安 /45
蒋介石与黄埔建军	黄道炫 /59
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 （1927~1932）	王奇生 /78
从蒋氏下野到蒋汪合流	金以林 /105
“开发”与“救济” ——抗战前关于开发西北的讨论	刘 萍 /131
战时人口内迁与重庆	程朝云 /148
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封锁	王士花 /174
侵华日军 731 细菌部队与“特殊输送”制度	卞修跃 /188
近 60 年来美国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	戴东阳 /214
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性质的一些思考	赵一顺 /243
1949 年以来大陆地区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	杜继东 /257
20 世纪上半期香港文化发展简论	张 丽 /286
转口贸易的黄金期 ——1900~1941 年香港转口贸易研究	张俊义 /306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夏春涛 /327
“尊崇圣道”与“修明市政”之争 ——以 1919 年广府学官事件为中心	唐仕春 /359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评析	左玉河 /382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人力车夫管理与救济	杜丽红 /407
巴黎中国学院述略	葛夫平 /425
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张 静 /445
中国国民党与国统区韩国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 问题	邹小站 /474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 (1942~1946)	罗 敏 /508
战后台湾的法律地位与美国对台政策 (1945~1949)	汪小平 /536
国家利益的抉择 ——从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看苏联 1949 年对华政策	栾景河 /566
清末民初考据学方法的发展	罗检秋 /586
民国科学史之一例:地质调查所的成功与启示	李学通 /605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刘 巍 /626
20 世纪 30 年代关于奴隶社会的论争	李洪岩 /674
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	赵利栋 /694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贾小叶 /725
关于“五四”个人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王法周 /746
论潘光旦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观	吕文浩 /763
余日章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早期本土化	赵晓阳 /784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 变革的几个问题

李细珠

关于清末政区变革问题，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台湾建省与新疆、东北改行省。至于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则因为或分而即合，或议而未建，故不太为人所注意^①。政区变革往往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这是观察政治变动的一个很好的角度。本文拟对清末新政时期的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作一专题论述，着重考察各种动议的前因后果，以期为观察清末政治史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一 裁撤漕运总督与苏淮分省始末

清代江苏的地方行政制度颇为特别，境内有两督一抚三个中心：省级行政长官有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巡抚驻苏州，漕运总

^① 以往的相关研究甚为简略：关于苏淮分省参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17～11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05～207页，中华书局，1986。关于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参见纪德士《察哈尔与绥远》，第16页，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社，1937；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册，第356～3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另外，有关清代边疆政策与清末边疆新政研究的论著也有所涉及，参见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汪炳明《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杨策《评清末在川边、西藏的改革新政》，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督驻江北淮安之清江。虽漕督自有专职，但因其兼有巡抚事宜，而与地方吏治密切相关。在清末，正是由于漕运的衰落，在裁废漕运总督的过程中而出现了苏淮分省问题。

苏淮分省起因于张謇的徐州建省动议。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拟就《徐州应建行省议》，系统地提出一个徐州建省计划。首先，他说明了徐州建省的重要性。一方面，徐州地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地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徐州建省具有抗衡英、德侵逼之“外患”与消弭会党起事之“内乱”的战略意义。徐州处四省交界之地，各省政治势力鞭长难及，本为“内乱”之渊藪；如今又夹在英、德势力范围之间，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则很难抵挡英国势力的北犯和德国势力的南侵。“其在今日，非建行省设巡抚，则断乎不可”。其次，他规划了徐州建省的具体办法。他建议以徐州为中心，从苏、鲁、豫、皖四省各分出一些州县，共计 45 州县，划归徐州行省。再次，他分析了徐州建省的利害条件。其有利条件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一是“增官不必添员”，裁漕运总督以徐州巡抚兼之，升徐州道为布政使，以淮海道兼按察使；二是徐、海、淮、泗、沂、济、凤、颖各州民气皆“朴嗇劲悍”，可就地练兵。所谓“四要”，是指徐州建省有利于训农、勤工、通商、兴学四大要政。至于不利条件，则有“三难”，即得巡抚难、巡抚得人难、筹款难，指的是人才与经济条件。“若鉴于二便、四要而以为不得不建也，有人有财，虽有三难，直可旦夕举之”。最后，他进一步强调了徐州建省的重要意义。他说：“吾惧徐州不日龙争而虎斗，迭进迭退；芒砀大泽，我之伏莽梟徒又乘机窃发，或不免举足左右，以为敌用，为东三省之续也”。^① 在此，他仍然是从消弭

① 张謇：《徐州应建行省议》，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 1 卷，第 80～83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内忧外患”的角度立论。客观地说，张謇这个徐州建省计划既有抵制英、德列强侵略的积极意义，也有加强清王朝统治的用心，如他自己所说“盖为中原腹地治安计也”^①。

张謇的徐州建省计划经由署两江总督端方代为上奏，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政区的设置，不仅关涉到行政区划问题，而且涉及一整套的地方行政制度，尤其是行政官员配置问题。在江苏，本有两督一抚三个中心，徐州建省势必与漕督势力冲突。恰在此时，漕运总督的裁撤问题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漕运在清前期本是与盐、河、兵并列的四大政之一，故特设漕运总督一职，体制极崇。道光以后，漕政弊端丛生，清廷开始改制，或折收银两，或改行海运。咸丰、同治时期，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南五省事实上已停止漕运，迄清亡而未恢复。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苏、浙江、山东三省正式停止征漕，至此，八省漕运全部停止。^②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认为漕运已是“有名无实”，主张将因漕运而设的屯田与卫所全部裁撤^③。次年，清廷正式谕令将屯饷改为丁粮，撤消屯田、运军名目，裁撤卫守备、千总等官^④。光绪三十年（1904），御史周树模奏请裁撤漕运总督，他认为：“各省卫官已撤，屯户并改丁粮，归州县经征，南漕半改折色，半由海运，各省粮道亦次第裁减，漕督无官可辖，而体制极崇，殊非综核名实之道。”^⑤

清廷把端方代奏张謇的徐州建省条陈与周树模的裁撤漕运总

①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6页。

②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468—470页，中华书局，1995。

③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22—142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④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3册，第1732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⑤ 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282页，中华书局，1984。

督奏片一并交给政务处议奏。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政务处将会议的结果上奏,其要点有二:一方面,基本上否定了张謇提出的徐州建省计划。“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请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即不宜分割四省地盘建立徐州行省。另一方面,变通提出了一个苏淮分省的新方案。同意裁撤漕运总督,将其缺改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据此,原江苏省一分为二,苏、淮划江而治。本来,江苏省的现状早已是两分,分别以驻江宁的两江总督和驻苏州的江苏巡抚为中心,各领有江北与江南之属地,“久若划疆而治”。江北设立江淮巡抚,即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江、淮、扬、徐四府及通、海两直隶州全归管理,巡抚驻清江,即为省会,并以淮扬海道兼按察使銜;江南仍归江苏巡抚,以苏州为省会。此议得到清廷上谕的批准。次日,清廷调恩寿为江淮巡抚,以陆元鼎为江苏巡抚。^①苏淮分省始成。

苏淮分省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上海的《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从地理、历史、民风等方面来看,建省当在“徐州一带”,所谓“徐州一带”,不仅包括江苏之江北各府县,而且包括安徽之凤阳、泗州,山东之曹州、济宁,河南之归德。“故徐州今日不设巡抚则已,若设巡抚,宜合以上各府另组织一行政区域,不宜合长江下流之扬州、通州等同一区域,更不宜合江南之江宁府同一区域”。如果仅以江苏之江北各属与江宁一府为江淮省,则不能有效地控驭苏、鲁、豫、皖边境,“但有新设抚军之

① 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282~5283页。按:据周馥自订年谱记载,当端方将张謇条陈上奏后,政务处“议久不决,嗣某枢乃请割江北淮、扬、徐、海,设巡抚,划江为界”(《周恂慎公全集·年谱》卷下,第9页,秋浦周氏1922年校刻本)。不知“某枢”为谁?待考。又,所谓苏淮“划江而治”,其实也是大致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属江苏之靖江县实在江北,而划归江淮之江宁府又在江南。

名，而无新设抚军之利也”。^①

江苏官绅更是群起反对。苏淮分省的结果与张謇的徐州建设设想大相径庭，张謇颇感失望。他对所谓“江淮省”的建置大为不满：“闻建设江淮省，此大谬，痴人前难说梦，信也”。“苏抚端方懵然入奏，部懵然因其说而易名为江淮，以漕督为巡抚，非驴非马矣”。他立即致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请争江淮省事”。^②

与此同时，江苏京官相继联名上奏表示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工部侍郎陆润庠领衔会同陆宝忠、顾肇新、陈名侃、吴郁生等人上奏，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官制问题。江淮、江苏本是一省而有一督一抚两个中心，若再设巡抚，则是一省两抚，不仅未有先例，而且督抚同城的湖北、云南刚刚议裁巡抚，“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纷歧”。二是政区边界问题。苏淮分为两省，划江而治，则江苏仅有四府一州，“地势平衍，形胜全失，几不能自成一省”。江淮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三是政区幅员问题。清制按户口与幅员分省为大、中、小三等，如苏淮分省，江淮仅及中省，江苏只能由大省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四是行政问题。江淮三府二州之地方要政，向来由江宁布政使禀承两江总督办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丛胜，今之改设，似出无名”。若江宁布政使仍在江宁办事，“则江淮巡抚，孤悬虚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事军政之要”。总之，他们认为：“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因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疑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江苏跨江立省之定制不宜轻改，江淮分省必须慎重，希望朝廷谕令廷臣与沿江督抚会议覆奏。“奏

① 《恭读本月二十二日上谕谨注》，《时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 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546、866页。

人不报”。^①

随后，江苏京官又公推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领衔再次上奏，又提出四点意见：一是苏、淮单独立省，则彼此削弱，不利于江、海军事防御。“江苏跨江为省，论富庶则以苏、松为首，规形势则以淮、徐为先。一旦画江而治，则江淮无江苏，势必易富而为贫；江苏无江淮，亦必转强而为弱。况江苏为海疆要地，长江为舆图中心，江、海各军，全赖号令画一；分省而后，万一督抚拘于畛域，意见分歧，必致贻误事机，动摇全局”。二是苏、淮分为两省，摊派之款相应增加，人民不堪重负。“江淮瘠苦之区，固不堪此；即以江苏而论，向来筹款之法以淮盐为大宗，今既以盐务归于江淮，挹注之源立穷，摊派之累愈重，筹饷无计，养兵无资，竭泽而渔，揭竿可虑”。三是苏、淮划江分省，不利于防范长江“盗匪”。“诚以两省交界之区，往往为盗贼渊藪；事权归一，防范易周。今长江上下游枭匪出没无定，若苏、淮划分两省，水陆诸营各分界限，互相推诿，此拿彼窜，盗匪转得藉以藏身”。四是江淮新设一省，将引起外国列强争夺利权与中外交涉的麻烦。“多设一省，各国多生一窥伺之端。……设领事、增商埠、增教堂之举，势必纷至而沓来。徐、海民气悍强，少见多怪，交涉棘手事件将因之而生”。^②二月初九日，清廷将恽毓鼎等此奏连同陆润庠等前折一并发交政务处议奏，并谕令两江总督周馥会同商部顾问官张謇察看情形速议电奏^③。

周馥一面与张謇“酌议”^④，一面会商湖广总督张之洞，希

① 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288～5289页。

② 《恽毓鼎奏江淮分省事宜折》，《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页；另见《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④ 《各省内务汇志·江苏》，《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